

杨奎松著作集

革命

肆

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著作集

革命

肆

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前 言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半是在1980年，至迟不超过1981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同学那里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5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1936年4月底5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像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4月底5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

同是一个4月底5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1987年，我试着帮助两位同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可想而知，在1989、1990、1991年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众多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1989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传主刘鼎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做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恰恰就是刘鼎先生自己在1975年所做的追忆笔记。而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在西安事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张魁堂先生。其分量可见一斑。

既然是刘鼎先生自己所做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先生应当对当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有所记忆，更应当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即使是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历史资料。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毋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对于他自己当年的密报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内容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文章中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中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1936年7月去了。结果事

情的经过就变成了一个怪圈：即在4月间延安会谈期间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在延安会谈时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这时却又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呜呼哀哉！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这样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变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甚至，当许多读者从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报纸杂志上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就此提出疑问：那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西安事变史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抗日的张学良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当然，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的有关“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这些曾经风行于当年大西北的明显地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可是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特别是同西安事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是，说以往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开了西安事变留存于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怕是言过其实。自张学良先生完全实现了人身自由之后，新闻界以及历史学界之所以频频重提西安事变的问题，正好说明了有关西安事变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至少，在笔者看来，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关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问题还没有深入地进行探讨。而前此关于西安事变

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回忆史料十分丰富。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像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过多地依靠回忆史料来描述史实，也成了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翻开有关西安事变史的著作，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唯一根据的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记得在十二年前（1983年），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司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据说此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

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但事实上，还在1985年以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1985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直到1994年《毛泽东文集》（第一、二卷）和《毛泽东年谱》相继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以及与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在这些文献中间，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比如像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行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得最多的，正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两百件。这还不算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若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但若说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

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

部”的。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不要说这些所谓“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大量流传国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即使是在国内,利用这些已经在“内部”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俯拾皆是,为什么偏偏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能或很少利用它们呢?(况且,从两年前开始,《党的文献》,即《文献和研究》和《中共党史资料》等过去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已经公开发行,此前的刊物也因此全部对外公开出售。)其实,说到底,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多半严重地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甚至,一方面有关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档案大量公开,另一方面诸多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著作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否定中共曾经直接对张学良发生过重要影响。有人公开宣称,中共当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不仅在整个事变中,过去有关周恩来的作用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而且在整个事变的形成过程中,张学良也始终是居于支配的、决定的地位,完全凭据自我意志行事,与其说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倒不如说是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忙。因为,张学良不仅帮助中共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共的命。

很可惜,我从来不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也很少对西安事变的问题作个案的研究,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来评头品足。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将解开许多仍旧是谜一样的问题,并且告诉那些关心西安事变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读者,过去写在书里面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则需要重新去了解。在这方面,我曾一直寄希望于我的一位同学。但是,在过去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莫斯科看到了俄国人已经解密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档案以后,我相信我不应当再等下去了。虽然这本书最后没有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还是很感谢侯样祥先生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们约我来写一部有关西安事变的书。尽管我很清楚,这在我本人很可能是“越俎代庖”,但我仍旧相信,我所选择的区别于前人的独特角度,将使我能够做得比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要好些。因为,我始终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其结果通常总是

更可靠的和更重要的。

不论我在这本书里提供的新的解释能否为多数读者所承认，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缺少了这种角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那些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读者注意到我书中所介绍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新的史实。关于这些情况，我曾经在1992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在今天的这本书里，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完整地并且是相当细致地描绘出来了。我唯一想请读者原谅的只是，为了使那些十分珍贵却长期被人忽视的历史文献重新为人所重视，我在书中对于某些我认为有助于说明历史事实的文献资料作了较详尽的引证。当然，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我相信，无论我的这本书的读者是否愿意详细地研究这些资料，在读过这本书之后，都会对当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留下与前不同的印象。

为了这本书，我当然必须首先感谢我的那位同学。最早让我开始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发生兴趣的，就是他。没有他，我不可能写这本书。我深感抱歉的是，我没有等到他继续完成他的研究。但我希望他知道，如果我的这本书揭示了某些历史的真实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当初帮助的结果。

为了这本书，我尤其要感谢台北的蒋永敬教授。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蒋教授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关心使我深为感动。本来，我对于写这本书一直相当犹豫，正是蒋教授的鼓励和他为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所写的书评，促使我下决心完成这样一本书。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韦斯塔博士和俄国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舍维廖夫教授。由于韦斯塔博士的帮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文献；而舍维廖夫教授则帮助我克服了我在阅读资料方面所遇到的许多语言上的困难。

杨奎松

1995年5月于北京翠微园

目 录

前 言 / i

第一章 由战争走向妥协 / 001

一、西征北上	003
二、陕北称雄	025
三、洛川谅解	042
四、延安拨雾	061

第二章 “西北大联合”计划 / 083

一、反蒋酝酿	085
二、入党初衷	101
三、八面来风	118
四、引弦待发	144

第三章 “打通国际路线” / 167

一、“逼蒋抗日”？	169
二、艰难交涉	191
三、兵败黄河	212
四、暗渡陈仓	236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 259

一、山雨欲来	261
二、破釜沉舟	283
三、战耶和耶？	305
四、孰进孰退？	321

第五章 从“革命”到“兵谏” / 353

一、皆大欢喜	355
二、风云突变	380
三、福兮祸兮？	401
四、柳暗花明	418

附录一 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约定的通电通信代列表 / 441

附录二 蒋永敬序 / 442

附录三 张学良入党之谜（大陆版代序） / 444

参考文献暨征引书目 / 451

第一章

由战争走向妥协

一、西征北上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讎的做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

但反过来，只要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先统一后御侮，他就注定要以消灭红军和清除各种地方势力为首要目的。为此，他不仅不得不暂时牺牲中国东北等地的领土主权，而且很难不把东北军或其他地方军队派去“剿共”，因此也就很难不使东北军的张学良或其他地方势力的领导人因力量损失而对蒋产生反感。只要存在这种情况，而中共又改行了统一战线政策，那么，不论它在哪里，它都会注意到这一矛盾，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来削弱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结果，西安事变，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事变的发生，多半就很难避免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和矛盾。

不管历史现象的本身有多么复杂和矛盾，也不管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通过以上所举的事实与逻辑，不难发现，西安事变不仅仅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共的影响并有中共的作用在其中的。因此，要谈论西安事变，不能不谈论中共，不能不注意中共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策及其变化。然而，人们过去对中共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作用谈得很少。事实上，可以确信不疑的是，张学良走向西安事变的所有步骤，都是从他和红军在陕北接触以后开始的。所以，要了解西安事变的由来，或许用不着从张学良东北军如何丢掉东三省说起，却不能不从中共为什么会到西北地区来，又是怎样和张学良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的情况说起。

中共和红军为什么会到西北来呢？简单地说，是因为两点。第一，中共和红军所以会从比较富庶的中国南方辗转退至贫瘠荒芜的西北地区，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实施“安内攘外”的政策，必欲消灭中共和红军，至少也是要把红军赶出靠近中国心脏地带的南方地区，频频“围剿”和进攻，使得力量本来就弱小的红军难以在南方安身。第二，中共和红军所以非离开南方根据地不可，也与它当时所实行“孤家寡人”的政策有关^[1]。这也就是说，即使那个时候中共与张学良有所接触，事情也搞不成后来那个样子。因为，在1933—1934年间，中共和红军仍在南方根据地时，它们至少曾经有过两次十分类似的机会，可以和国民党反蒋派结成较大规模的反蒋联盟，结果却一事无成。

第一次发生在1933年，冯玉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其中吸收的中共人员远比后来张学良在西北时吸收的还多；另一次是在稍微晚些的时候，在1933年底至1934年初，受命参加“围剿”江西红军的十九路军将领揭旗反蒋并发动成立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与之毗邻的中央苏区的红军将领曾和他们达成了反蒋协定。但是，这两次机会都

[1]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0页。

白白地浪费掉了。因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奉行的是泾渭分明的阶级路线，反对与国民党任何上层人物建立统战关系，只想暂时利用与这些上层人物的协议，合法地深入到对方的下层中去，以便争取对方的士兵以为己用。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像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样，成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不仅便利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各个击破这些反蒋派，更葬送了可能缓解中共和红军军事困境的重要机会。蒋介石中央军在分别解决了这些反蒋事变之后，转而集中了更加强大的兵力来进攻红军。原本就弱小的红军，在损兵折将、孤立无援、陷于生死关头之际，不得不下决心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南方根据地，开始了史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军事大转移。^[1]

长征，是中共此前政策、观念及其军事路线诸多错误的结果，但它恰恰是我们了解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一个必要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导致西安事变一切主观和客观条件都是从长征开始生长起来的。表面看起来，长征以后的国共力量对比越来越对中共不利，红军的生存常常危在旦夕，然而，正是由于中共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忽而西，忽而南，忽而北，最后选择转向靠近苏联的西北地区，使中共和红军获得了生机。他们不仅意外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统战政策的指示，又恰巧与对蒋心存不满的张学良东北军相逢。两相结合，这才造成了石破天惊的大举动，迫使看上去已经胜券在握的蒋介石最终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并且使历史的天平由此开始渐渐转向了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苏区，是1934年10月的事情。当时，在经过多年的鏖战之后，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南京国民党集团终于占领了共产党在中国南方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迫使共产党的军队从此远离中国的核心地区，向西南偏远地区转移。

[1] 有关红军长征的实际距离，近十多年海内外陆续有不少具体的考证和说法，这里仅沿用习惯性的说法而已。

不过，率先退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领导的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共产党的这支军队原先经营着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北临淮河，西抵京汉铁路，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该部还在1932年就因反“围剿”战争失败而辗转退入四川北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根据地。几乎同时退向西南地区的是曾经经营着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第三军，它在被迫离开湘鄂西之后，转战将近两年之久，也在贵州东部建立起一小块根据地。随后进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经长期坚持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军第六军团，它于1934年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西征”，一方面为中央红军向西退却探索道路，另一方面准备会合红三军后回师接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所谓西南地区，主要指的是云、贵、桂、川、康五省区。这一带不仅山多路险，交通不便，而且多数地区物质条件差，少数民族多。因为地形恶劣和交通不便，西南地区地方势力向来盘根错节，故近代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几乎都不能对这些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红军之所以纷纷退向西南地区，也是注意到了这样一些条件。既然红军在靠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中再也无法坚持下去，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又同历届中央政府一样，尚无迅速实现一统天下的能力，跑到远离南京政府统治圈以外的地区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红军实力的一种好办法。

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在高度重视中国红军这一特殊的革命形式了。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红军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条件问题，使他在充分肯定红军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必须大力发展和全力经营的同时，特别注意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中共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资及人力资源又比较充足的地区，来作为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据此，他并不看好中国红军在靠近沿海和靠近南京中央政府的中国心脏地区发展起来的几块南方根据地，而是看重了中国西南的四川省。他特地通过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要他们注意向中国西南的四川省发展，说：